

# “干部辛苦”如何化为“人民幸福”

继“中国式过马路”之后，“中国式接孩子”又成网络热门话题。19日，南京华侨路茶坊将这一话题置顶到首页，立即引来众多网友的跟帖热议。而类似的话题，在全国各地的论坛上，也都吸引了众多家长吐槽。(10月20日新华网)

## 接送孩子上下学是种民生尴尬

逻辑有两种，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正像中国逻辑的必然性一样，“中国式接孩子”，可视为本土的一个特色。因为，每到放学时间，在国外多数地方的小学门前，不可能见到中国式的车水马龙的接送。那种家长们开着两轮、三轮、四轮等各式交通工具，早早就在翘首以待，人群之众、秩序之嘈杂如集贸市场，是只存在于本土的场景。

“中国式接孩子”，是一种日常生活现象，但这一生活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却是诸多社会问题。往小处说，它是种人力资源浪费。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不管风吹雨打，这已成为很多中国家长的功课。父母不接送，也会有爷爷奶奶代劳。就是这些家长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值钱，或值得付出，但这种时间资源的浪费，谁能说不是社会资源的浪费？换言之，利用这些时间资源，人们干点啥不好？时间就是创造，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财富，时间就是生命，此一时，变成了时间就是损耗。

孩子都长着腿，都能蹦蹦跳跳地往前走，可为什么家长都不放心孩子自己上学放学？这里面的说道儿就更多了。于那些家里的独苗而言，有个伤不起的问题。在多数学校门口，都会有大量的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毫无秩序地停在学校附近，更有不少小商贩夹杂于人流、车流之中，不仅瘫痪了交通，还给孩子们的安全埋下隐患。家长接送孩子，不是爱好，不是中国式习惯，是他们心理难以承受那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安全闪失。

“中国式接孩子”，现象形成的原因复杂，无论从孩子的个人成长而言，还是从其他方面讲，都绝非是件好事。一个城市如有几十万乃至百万的小学生以及幼儿园小朋友，那么，每天要往返学校两次人流将是数百万计，仅此一个单项纪录，对城市的交通压力就相当得大。由此构成的内在混乱，又对学生的安全造成了新的威胁。这真是一个老乱子未解又添一个新乱子。

“中国式接孩子”是种民生无奈、民生尴尬，也表明国人缺乏安全感已深入骨髓。生养这个本土特色，不是三两天的事情。孩子的安全大于天，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创出办法，让孩子安全，家长放心。谁家孩子谁心疼，除了交通安全问题，拐卖儿童的黑手无处不在，学校附近的小店里，多是垃圾食品和有玩具，一系列问题的存在，怎会不生出“中国式接孩子”的窘境？说到底，这些现象所折射的还是人们的生存压力，“压力山大”，解决起来，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智慧。

今语

10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四季度要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参与分配改革方案讨论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预计，方案12月底就能出来。

## 不要失掉改革调整的灵敏度

收入分配改革等了8年，目前终于要有眉目了。当然，广义上的分配改革并非毫无进展。工资条例、税制改革等等，都可视为分配改革的前奏，只是，这些对经济体制并无较深的触及，以体制改革而言，不能等量齐观。完整意义上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了这么久，研究了这么多年，原因自然在于改革是个繁杂、系统的工程，问题多，阻力大，不能不谨慎。但是，梳理分配改革的新闻和议题，又很难说这8年等得值得。

分配改革，就是要重新调整目前不甚合理、且日渐固化的利益分配格局。如果说忌惮“利益集团阻挠”，那么分配改革将不存在任何改革时机，因为既有的特殊利益格局只会继续固化。坐等改革时机，就是让既得利益做大、做强，然后改革空间将被迫一点点流逝。

我们常说试错改革、渐进改革，其前提是，改革至少要逐步积累，循序推进，在试错中丰富经验，在纠错中完善改革举措，谋求渐进的成果，进而累积成果，而非非累积问题。改革纲领、目标要强硬，但具体实践离不开柔性性与灵活。这就是说，再好的方案，也要通过试错来完善其自身，而不是坐等问题积累，并在不断累积的问题上进行更“深刻”的研究。无论方案多么系统、完整，它都应留下一个反馈—吸收—解决问题的开放机制，如不然，就会因新增的问题而束手不前，甚至可能全盘推倒重来。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宜早不宜迟，越是延缓，试错机会越少，问题的累积将越难以被消化，甚至将积重难返。

改革的力量也是会累积的，不在体制的框架下累积，就在在体制框架之外累积。改革与变革，只是量化累积的差异，其次则体现为谁来主导改革或倒逼变革的问题。我们不能总是等待改革力量的蓄积，以至于改革就意味着震荡治疗，以为一说到改革就要牵一发而动全身，仿佛改革从没有具体而微的切入点。从认识改革紧迫性的角度而言，问题不体现于分配改革，还有其它。

我们处在一个转型时代，需要改革的问题多，改革议程应有相对稳固的呈现，几年解决一个小问题，多少年解决一个大问题，这要有一定的频率。在试错、纠错中推动具有一定灵敏度的改革，这应当成为常态。改革或者推不动，或者劲攸得越久越足社会震荡越大，或者错了而回不来，这是利益、思维和体制僵化的表现，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教训。

以8年等待一个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这个时间确实长了点。肖畅

据报道，2011年以来，贵州省贵阳市结合县乡换届考察，探索实施干部“辛苦指数”测评，引导全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重点工程、重大任务、重要工作中苦干实干，以干部“辛苦指数”提升人民“幸福指数”。

测评干部“辛苦指数”，并与人民“幸福指数”捆绑，回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官念，其心可嘉。为官之道，在于为民，以干部之辛苦，增人民之福祉，其诚堪赞。至于干部“辛苦指数”与人民“幸福指数”之间的逻辑关系，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若说，古代的“民本思想”、“水舟理论”，官员为民众谋福利是一种道义，那么，现代行政学的“委托—代理”关系决定干部为人民是一种责任。无论是道义，还是责任，干部“辛苦指数”与人民“幸福指数”确实高度相关。大义上，社会发展，官民共享，幸福你我，不分官民；细节上，两者还是有别的，人民话语权越大、生活越幸福，干部的自由空间越狭窄、工作越辛苦。换言之，人民的“幸福”必然是建立在干部的

“辛苦”之上。

反过来，干部越辛苦，是否意味着人民越幸福，即“吾貌虽瘦”则“天下必肥”？倒也未必，干部辛苦并非人民幸福的充分条件。老实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干部辛苦程度自称“第二”，无人敢称“第一”，尤其手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连周末正常休息也难有保障。那么，公众“幸福指数”有否水涨船高？只因“干部辛苦”欲转化为“人民幸福”，还有若干决定因素，譬如工作方法、效率、方向等。

假如，干部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为人民想为，与人民同心同德，那么“干部辛苦”就会最大程度转化为“人民幸福”；倘若，干部的工作方法不对，效率不高，说的是空话，要的是花枪，如文山会海，那么，干部再累也与人民幸福关系不大；或者，“中午围着盘子转，下午围着骰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干的是私活，想的是享乐，如吃喝玩乐，那么，干部越辛苦越没精力为人民服务；抑或，干部干的正是人民恨的，如政绩工程、铺张浪费、包二奶、贪污腐化等

等，则干部越“辛苦”百姓越不幸，社会越不幸。腐败干部越辛苦与人民幸福越背离，个人台上口口声声“为人民”，台下点点滴滴为自己，这种例子也确实存在。

与“幸福指数”相比，干部“辛苦指数”测评更无操作性。一旦将偏于主观感受的项目量化，难免陷入无厘头的泥沼。同样的工作，有人举重若轻，有人举轻若重，辛苦不辛苦，视乎个人的年龄、健康、经验、能力、观念等，何来统一标准？标准难以确定，测评更加可疑。从报道来看，贵阳干部“辛苦指数”由三部分——“上评下”、“主官评成员”、“下评上”构成。上、中、下三个维度进行，似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关键的细节在于：“下评上”的权重有多大。假如“下评上”只是“彩排”，干部“辛苦指数”测评最终仍是自说自话的游戏，一切将变得毫无意义。

只有最大程度还原人民监督公权的权利，才能确保干部在保障人民幸福的前提下，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练洪洋

## 感化未遂



10月12日凌晨，家住长沙某小区的陈芸独自在家，遭遇一男子入室抢劫，她试图以温情感化，给他递烟，还问：“这么晚，饿不饿？要不要给你炒个蛋炒饭？”但男子并未感动，反而抢走了她的手机和钥匙。陈芸也没报警，不想第二天，劫匪再登门，被居民合力抓住。(《潇湘晨报》)

《悲惨世界》里，苦役犯冉阿让偷了教堂里的银烛台，被神父原谅，这令他洗心革面，后来成了体面人……《圣经》里也说，有人打你的左脸，要把右脸也送给他打。许是种种关于爱的说教影响了陈芸，她才会异想天开要给劫匪炒个蛋炒饭。

但我们还有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除非达到了“舍身饲虎”的境界，我辈俗人，还是别那么泛爱为妙。出于当时的安全考虑，炒个蛋炒饭或下碗阳春面什么的都是可资利用的自我保护手段，但事后却千万记得报案，警方说：不报案就是对恶的纵容。

文/言者 图/春鸣

## 反对异地高考是保利益而非争权益

10月18日，20余名家长代表到北京市教委信访办，希望能约见北京市教委委员主任，就异地高考政策问题进行交流。与此同时，一批京籍人士也陆续出现在北京市教委信访办门口，并明确提出了反对放开异地高考的诉求。(10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争取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个普通人的正常选择，而社会矛盾也是在争取与妥协中逐渐找到中和点，从而弥合各方差异，解决冲突。这本是一个正常的政策出台过程的利益博弈过程，但这并非表明自己所争取的就是

“正当权益”。“利益”与“权益”，虽只一字之差，区别大矣。权益自当得到保障，而特殊利益则应逐步破除，异地高考之争，也正是权益与特殊利益之争。京籍人士“义正词严”地反对放开异地高考，“理直气壮”地称自己所享受的一切为“正当权益”，正是混淆了权益与特殊利益的概念，以既得利益为自己的“正当权益”，寸土不让，缺乏起码的正当性。异地高考是争取的“权益”，而反对者保卫的只不过是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已。

京籍考生的“权益”如何，其实早有定论。北京高等教育资源的绝对量居全国之首，人均拥有资源量更是高于其他地区。人力、财力、物力对北京有所

倾斜，不能说不对，首都的建设自当走在前列，但建设的成果却不能以户籍来进行人为限制，因为首都毕竟是全国人的首都。当“外地人”在北京工作时，作为北京发展进步的力量，他们的子女理所当然地应当享有首都的权益。

因此，必须厘清权益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从高考来说，“权益”是法定的，是不分地域的考生所共同受到法律保护的内容，是平等的；而“利益”则是因各种原因固定下来的，只为某部分群体所享有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京籍人士的“权益”自当保障，但属于特权部分的“利益”则需要逐步破除。而“在京外地人”的基本权益，则有赖于京籍人士作出应有的妥协。

廖德凯

## “元芳体”意在追问事实真相

有了微博，一切网络传播得特别快。继“杜甫很忙”、“包青天很忙”之后，“元芳，你怎么看？”这部陈年旧剧《神探狄仁杰》的一句台词在网络上大火。一天之内被网友问到250万次，可谓比“杜甫”还忙。(10月20日人民网)

网络流行语流行一年又一年，出了一批又一批，始终有一种围观的效应贯穿其中。从传播心理学角度说，关注就是力量，围观就是压力。或许，一句话说一遍是随意，重复三遍就显得有趣，而更多的人在不同场合都说就变得很有趣了，这也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在网友看来，一句“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反映了“老男孩”们对烟火人间和汤水生活的依恋；一句“你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直

逼痴男怨女们对前尘往事的辛酸追忆。而对“元芳，你怎么看？”也可以有直面事实真相的解读。你怎么看？多数追问的潜台词应是：尽管事件本身云遮雾罩，但实际上我已戳破它部分秘密。

元芳在《神探狄仁杰》里，官职正三品上，且武艺高强，打败了虎敬晖、闪灵等一流高手，但对网友来说，他只是个虚拟的对象，不停地使用“元芳，你怎么看？”表明的是我怎么看。作为被问的元芳怎么看不重要，作为在现实中主体的我怎么看才最关键，才能直指问题的要害。在语气表达上，这句话似乎是轻松的，甚至是调侃的，但积聚的一次又一次的追问，在网络这一广阔的平台，自有其山呼海啸般的力量。它是公众的集体期待，它等待着公权力对那些蹊跷事件作出真实有力的而不是敷衍塞责式的回应。

伊文

日前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了在桂林工作的文氏四兄弟寻找走失母亲的故事，在新闻之后还刊登了四兄弟寻人的联系方式。节目一播出，除了文妈妈的下落惹人担心之外，新闻本身也得到了不少观众的正面响应，在网上被称为“彰显人性的光辉”，还有不少人真的伸出手，帮忙四兄弟寻找母亲。

## 《新闻联播》播寻人启事的人本价值

就节目本身而言，这不是一个独立的寻人启事，是央视新闻节目在近期“我的父亲母亲”系列报道中的一个侧影，是对失忆老人关怀节目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新闻联播的平台上播出一个普通家庭的寻人故事，的确更有助于贴近民心，也贴近社会发展的脉搏。

在人们的印象中，《新闻联播》往往是中规中矩的。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新闻联播中曾看到最美乡村女教师、爱心小院、讨薪日记等基层报道，让不少人新闻联播的固有看法在发生变化。当然，即便是这次的“寻找母亲”节目，也有一些观众将信将疑，或者对播出的方式有所讨论。从态度上讲这些都十分正常，但是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新闻节目，的确更需要把握社会发展的直接脉动，展现人性故事，呼应观众诉求，讲述更多“草根故事”。

新闻联播是中国收视份额最大的新闻节目。公众希望它能改变一下刻板印象，既能看到全国最重要的新闻，也期待能看到这些新闻和自己的直接关系。其实对于媒体人来说，每一条新闻都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新闻的价值彰显人的价值，新闻的重量彰显公民的重量。无论新闻的主角职位大小高低、故事悲喜喜欢，越是真实、越从生活中，越能找到人性的共鸣，新闻就越有生命力。

新闻节目贴近民意、展现人性，其实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宏大叙事。就新闻联播本身，这些年来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变化。比如不少普通人开始登录央视新闻联播，甚至还有农民工兄弟连着四天在新闻中“讨薪”的报道。这是一种进步，它一方面意味着新闻人主动求变，求观众认同，求社会关注；另一方面公众更多能从新闻中，找到他们关注的问题，获得非常真实的帮助。

当然，新闻不是社会发展的答案，而是社会发展的提问。新闻人提的问题越多，社会的思考就会越深入；新闻人提问的方式越直接，回答的公众也就越多。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中，新闻人提问的意识不应发生变化，提问的方式却需要常变常新。因为中国人的故事在变化，观众的寻求也在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联播的寻人启事，也在寻找新闻联播自己的改革路径。周庆安

记者从贵州省教育厅属下的教育发展基金会了解到，自2011年6月30日成立以来，该基金会遭遇“零捐助”尴尬，发出千余封邀请函无一回应。基金会秘书长表示，希望社会公众不要对公益慈善机构“一棒子打死”，多伸出援助之手。

## 教育基金遭遇“零捐助”让谁尴尬

该教育发展基金会可谓“生不逢时”，去年6月20日，正是“郭美美”把慈善“拉下水”的日子。在官办慈善机构被公众骂得灰头土脸之际，这个教育基金会10天之后逆势而生。

这边厢，官办慈善机构遭遇“零信任”，千余封邀请函无一回应，一分钱也没人捐款；那边厢，由媒体人发起的民间慈善“免费午餐”，却在湖南、广西、贵州等地如火如荼地进行，获得公众支持，惠及万千学子。这说明，社会从不缺爱心，也不缺钱，缺的只是信任，对官办慈善机构最低限度的信任。

除了对官办慈善信任不足，对于教育发展而言，公众的不满还在于：一方面财政性教育投入不足，1993年承诺到上世纪末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4%，而到了2011年也只有3.83%左右；另一方面，据权威调查显示，在义务教育阶段，我国城市家庭教育支出平均占家庭经济总收入的30.1%。换言之，还在义务教育阶段，孩子的教育支出就要花掉一个普通城市家庭收入的三成。公众已经为孩子的教育投入大量资金，教育还要通过官办慈善的形式向社会伸手，公众难免反感。

一组数字，很能说明慈善在教育发展中的边际效应正在下降。国人耳熟能详、为教育发展做过一定贡献的“希望工程”成立于23年前，当时全国GDP不到1.7万亿元，到2011年，总量超过47万亿元，足足是当年的27.7倍。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我国2011年为3.83%，若达到承诺的4%，教育经费就可以增加800亿元；如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增量将超过4200亿元。到2009年年底，20岁的“希望工程”一共共筹款56.7亿元！意味着，按2011年的GDP总量，只要教育经费投入提高0.012%，就可完成“希望工程”20年的努力。

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办的事情确实很多，这也经常被挂在某些人嘴边、成为为教育经费投入多年未达标的托词，事情的另一方面，公众看到的却是有的官员或部门铺张浪费、大手大脚。说每年省下数千亿“三公消费”可修建多少学校、资助多少贫困孩子上学是老调重弹，仅地方政府办公大楼建设投入一项，稍稍微紧一下，地方政府亦将大为改观。就像前不久被曝光的湖北麻城市，许多学校连课桌都没有，要学生自带课桌上学，而当地居然修建起豪华的政府大楼，仅今年的绿化工程预算就达1200万元。

慈善作为“查漏补缺”式补充，有存在的意义，而教育作为向国民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更大责任应落在公共财政身上。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教育必须获得更大的支持，在基本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补充性的慈善便可交由民间组织去办。广大